

第一章 出身黑彝奴隶主家庭 毕业于云南讲武堂 随同姑表兄龙云 一起投入唐继尧麾下

云南讲武堂是近代中国滇军的摇篮。虽然清政府创办的目的是想培养一批新式武装力量，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统治，但事与愿违，它在推翻中国千年专制政体、创建中华民国中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也造就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

卢汉是云南讲武堂的第四期毕业生。同时入学的，还有他的姑表兄龙云。他们都出身于云南昭通地区的黑彝贵族家庭，后来一起投奔云南护国将军唐继尧。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卢汉成为龙云的得力干将。

一 滇军的摇篮——云南讲武堂

周开勋说：

1905年陆军部奉清政府令变法，开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学校。如在威海卫设立海军学校，在保定设立军官学校，又在青海、西安、武昌、南京、云南等地区设立武备学堂和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1909年又在极少数省设立讲武堂。云南的讲武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立起来的。在兴办军事学校的同时，清政

府还命令陆军部编练新军 36 个镇（镇即后来的师），以袁世凯在小站训练 6 个镇为皇家的护卫军，其余 30 个镇分配于各省，云南设 1 镇，称为第十九镇。

清室为了要培养一批新式军事人员和建立新武装力量，命令各省选拔留日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向日本学习新的军事技术，以备回国充当各级带兵官，巩固其政权。

1908 年阴历十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溥仪嗣位，称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当国摄政，（光绪之弟溥仪之父），在军事上执行光绪生前决定的练新军、开办军事学校的主张。当时清室认为云南乃边疆重地，处于英、法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之间，对内对外关系很大，特派满洲大员锡良到云南接替丁振铎云贵总督之职，组织新军。锡良接任后，得悉云南有巡防军万余人，分驻三迤；使用的武器是一些独响毛瑟、九响毛瑟枪和土造的铜冒枪，甚至还有使用戈矛的；不但武器落后，训练也十分陈旧，只求学会能打枪而已，根本谈不上新的战略战术，一旦有事，难于应付。因此，他决定着手组织新军第十九镇，一面招募兵丁，一面将巡防军中的一部分士兵编入第十九镇，称之为新军。锡良鉴于要建设一支名副其实的新军，没有新的武器装备是不行的，于是动用了云南积存藩库的现金数万两，向德商购买步枪、马枪、机关枪、手枪、管退炮等武器，为装备第十九镇使用。当时第十九镇的编制是：镇统（即师长）1 人，镇之下设两个协统（即旅长），每协之下设两个标统（即团长），每标设 3 个管带（即营长），管带之下设 4 个队官（即连长），队官之下设 3 个哨官（即排长），每哨人数约五六十人，设 3 个班长。锡良将陆军第十九镇组成后，感到云南原有的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堂所教授的军事课程虽有一些改进但不完整，而各级带兵官若无统一的军事教育，就不可能有新的军事改革，遂奏请清廷在云南开办

讲武堂，将原有的武备学堂和陆军中小学堂撤销，归并讲武堂，重新造就一批新的军事人员，派到第十九镇，充当各级带兵官。清室采纳此议，即照准开办讲武堂。当锡良正拟筹备办讲武堂时，1909年秋后，被调任东三省总督，遗缺由广西巡抚李经羲继任。李到任以前，由云南藩台沈秉堃护理。这时沈护督即按锡良的计划积极筹备开办讲武堂，撤销武备学堂名称，以原任武备学堂总办高尔登为云南讲武堂总办。高接任后，对教育改进不大，虽设了步、炮两科，但与武备学堂的情形相似。1908年12月，中国留日士官生毕业。次年3月沈秉堃电调云南学生李根源回云南主办讲武堂。

李根源遵照沈的指示，积极进行筹备，选校址于承华圃开始办公，扩大了学校的组织。讲武堂聘请教官招收学生，准备教材，购买通讯、卫生器材和骑炮科使用的骡马等等，于1909年8月15日正式开学。

云南讲武堂的组织概况

云南讲武堂的组织形式分为两个阶段，在清末时期，负责人称之为总办。首任总办者为高尔登，这时学校的组织比较小，有甲、乙、丙三班学生，每班人数为80名，因此用人不多。对学生的训练只有步、炮两科。教学方面虽讲授步、骑、炮、工的学术，但不完整。着重讲授国文史地、算术、孙子兵法等。而且操场上的训练时间多，讲堂次之。高尔登任总办的时间很短，不到半年就辞退了，由李根源任总办。李接任后，即着手改组，扩大了组织，学生和教官也增多了。其组织如下：

校部设总办（即校长）1人

校部下设五个处：

（1）监督处：负责全校教育事宜。

(2) 提调处：负责人事调动和对内外事宜。

(3) 编修处：负责对内对外文牒事宜。

(4) 财务处：负责会计财务事宜。

(5) 军医处：负责医疗和卫生事宜。

每年设处长 1 人，处之下设科长、科员及工作人员。监督处较为重要，拟订各兵科的教育计划，制定进度实施表，严格要求各兵科，使学生完成学业，做到学了能用，到部队中能发挥作用。在学生组织方面，分设了步、骑、炮、工 4 个兵科，因而在这个处之下，设有各兵科的科长 1 人。

(1) 步兵科 (2) 骑兵科 (3) 炮兵科 (4) 工兵科

在科长之下，设有队长和队副。本科的科长即本科的主任教官，负责本科的教育训练事宜。队长队副直接管理学生，负有执行教育计划和进度实施表之责。四个科长及队长队副必须是军事专科人员。官阶与其他四处不同，如科长有少将或上校、中校级，队长有中校、少校级，队副有上尉或中尉级。

至于各科学生的多寡，是根据部队的需要而决定的。因为当时部队中无马无炮无工兵器材，所以特科学生经常不超过 100 人，有时只三、五十人。设特科学生，是为将来的准备。因特科学生人数少，在校统称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步兵队学生多，称为第一、二、三、四区队，每区队人数至少都有六、七、八十名。宿舍是每区队一室，特科学生每队一室。讲堂分第一、二、三、四教室，每教室规定 60 人。上讲堂时步、骑、炮、工学生是混合的。因为尽管是特科学生，也首先要学好步兵的动作，然后才学特科的学术，而且照样能当步兵的干部。有特种兵的组织，如果某部队需要若干人，学校分发学生时，即派往这个单位。

当时学校的职别分为三等九级，如将官级即分上、中、少

将，校官级分上、中、少校，尉官级分上、中、少尉。另有准尉级。在士兵当中，如班长即分上、中、下士，士兵中分一、二、三等兵。全校学生一律带一等兵的肩章。

学生在校的识别。军帽是硬盔。缝上 1 寸宽的红呢条子；帽顶是白色，周围镶了红色边，遮阳是皮制的，帽花是金色的三角星。步兵科的领章是红色，骑科的领章是黄色。炮科是蓝色，工科是白色。肩章是四个色，但四边镶了红边，中间缝了一条金线，中央有一个三角金色花，表示一等兵级。骑炮科学生每人发给一双马靴，骑在马上便于操作。骑科学生每人发一把战刀，骑在马上练习砍杀。星期日放假，步、炮、工科学生腰上佩带刺刀，骑、炮科学生一律使用马枪，骑科学生佩带战刀。这些规定都采用日本式。由于云南讲武堂学生的军帽是红色，全省军队的军帽颜色也随之变改了。由于军帽的颜色是红的，外省人称之为红头军。又称为滇军。

此外在制度方面制订有五项规则：

(1) 寝室规则；(2) 讲堂规则；(3) 饭堂规则；(4) 卫生规则；(5) 外出规则。

学校对五大规则，要求极为严格，极为细致，一点不得随便。

师生的来源和教学内容

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军事教官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文职教官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人很多，有的委派在讲武堂任专职，有的委派在第十九镇带兵，而在昆明附近的带兵官，在讲武堂担任专职或兼职，兼任了讲武堂的军事教官的统计有 40 余人。当时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主要由留日学生充任。

李根源任总办后，沿着高尔登在职时原有的甲、乙、丙三个班的学生继续上课。但这三班学生人数每班只有 80 人。学校既然扩大了 4 个兵科，学生就少了，因此着手招收学生。由于要改造第十九镇的军事教育，遂选调第十九镇中的管带、督队官、队官、哨官等人员约七、八十人入堂受训，加入原有的甲班生，人数约一百五、六十人同堂听课。继之又调巡防军的管带、帮带、哨官、哨长等人员约七、八十人，入堂受训，加入原有的乙班生，人数也到一百五、六十人同堂听课。另外招考了一批青年学生（由各县考送的）约 300 人，加入原有的丙班生，人数到了三百六、七十人同堂上课。同时又招考了一部分社会中的知识青年约百余人，称之为特别班学生，到毕业时同丙班学生一道列为丙班生。当时学校对学生先后入校的时间以班为称号。学生学习的时间规定两年毕业，但甲、乙班学生多半是带职受训，将近 1 年半，有的就回原部队任职了。丙班、特别班将近两年才毕业。李根源任总办时间有两年多，培养了 700 多骨干，派在第十九镇和巡防军当各级带兵官。辛亥革命，云南 9 月 9 日起义光复，这三班学生与昆明的守城部队互相冲杀。打垮了守城部队，占领了许多重要机关，使云南的封建统治垮台，对完成革命的任务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学校的教学内容

讲武堂的教育以军事学科为主，普通学科次之。学校开办初期，在军事教材中采用了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有战术学、筑城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马学、测绘学，这些教材称之为大教程。另外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之为小教程。此外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等，经过学习大小教程，学生明确了什么叫战斗，什么叫战术，什么

叫战略，认识了怎样叫做攻防战，怎样叫遭遇战，在实战中争取占领要地，发扬火力，仗打起来有佯攻主攻侧翼攻、中央突破、胜则追、退则守等。在学习到将毕业时，学生学会了师团的战术、军的战术等战术上应用的方法。能指挥一军人作战，也就能指挥大兵团作战。这是学校教学的要求。

学生在操场上学会了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动作起来非常整齐，不论横看纵看都在一线上，步法都是一致的，左右转弯时，决没有参差不齐，每个排面都在一条线上。

在野外方面，学生学会了指挥法。以一个团说，知道什么时候当开进，什么时候当展开，什么时候就要散开；也明白了排的跃进，各个跃进、展开等战术上的用法。

普通学科有国文、史地、数学等，要求不严。

在操场上的训练，是采取日本军队教育的方式，层层节制，绝对服从。在操作时，要求姿势端正、动作敏捷，每个动作必须做到纯熟而后已。否则反复地学所有的动作，与书本上要一致。

学校为了在操场上和野外的动作敏捷，在技术上设有铁杠、木马、平台、大小双杠、天桥、吊绳，以及跳高、跳远、撑杆跳等等设施。每周下午四时至五时半，有三次操练。每一个课目有技术教官到场，作出示范动作，讲授操作的要领。讲授完后，分成若干小组，临时指定几个学生当小组长，把这一小组学生带到铁杠、木马或天桥等面前，轮次学习。基本技术做好了，就要求做高等技术，如铁杠上的大车轮、杠上拿顶等操练。

此外每周有两次劈剑术和刺枪术，做到勇猛地对劈对赐，能防能攻。

学校的管理制度

管理方法，是层层节制，绝对服从。本科科长、队长、值星队长、值星队副、值星学生直接负责教管本科学生之外，另设有值星科长、值星队长、值星队副、值星学生，时间为一周，轮流充当。凡当值的人，挂一识别带，科长挂的黄色带，由右肩挂于左肋；队长、队副挂的是红色带，带宽约 1 寸 5 分；值星学生左手臂上挂一个袖套，用红布做的，宽约 2 寸，用白色布缝上三个字：“值星生”。值星科长的任务，管理全校各班各期学生的行动；值星队长、队副只管本期本班各科学生之责。如有两期或三期（班）同时在学校，因而值星队长就有 3 个，队副、值星学生亦然。凡当值的人，每日执行作息时间表，不论上讲堂下讲堂，出操收操，吃饭下饭堂，早上起床，晚上自习、睡眠，一切行动听到校部的号音，值星生即吹哨子集合学生清点人数。如上讲堂时，把学生带入教室后，教官到时，由值星学生发起立口令，向教官口头报告人数，教官还礼后，值星生喊坐下口令，同时还要填写一张人数报告表，将缺席人数和实到人数写明交给教官。下讲堂的号音响后，教官即停止讲课，值星学生仍然喊立口令，教官出讲堂后，学生才能出讲堂休息一刻钟。上讲堂时，值星官长有时到堂外视查一下。但在早上起床，晚上点名睡眠和出操时各级值星人员都要到齐。值星学生将学生集合清点人数后，即发立正口令，向值星队副口头报告人数外，呈上实到人数表。报告完毕后，发稍息口令，继之值星队副即向值星队长报告实到人数，由值星队长值星科长报告人数，呈上实到人数表。各级报告时，均发立正和稍息口令。这些是层层节制的表现。凡出操时全校科长、队长、队副均要到场。由值星队长向科长报告实到官长若干名，学生多少名。报告完后，科长即宣布照表实施开始动作。这

时值星队长、队副即向学生讲授科目，作出示范动作。讲毕后，将学生分为若干组，指定优秀的学生为临时组长，指挥学生操作，所有的官长在旁监督，看见有缺点即行纠正，要求极严。有时校长来看操，值星科长即发出立正口令。向校长报告全校实到官长若干员、学生若干名。报告完后，喊稍息，仍然操作。在收操前半小时，科长将学生全体集合，讲评当天操作的优缺点和操作中每个人的精神是否鼓劲等等，然后收操。

云南讲武堂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云南讲武堂创立时，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行将灭亡，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传遍中国，反清浪潮日益高涨之际。虽然清政府筹办云南讲武堂是为了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和建立新式武装力量，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但是由于云南讲武堂的教育基本上搬用了日本的尚武精神教育，而且教师中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受着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加上许多教师都是同盟会会员，因此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很快在学生中传播。这就为云南讲武堂师生能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讲武堂的学生毕业后，即分派到第十九镇和巡防军充当中下级带兵官，因此革命的种子已播于全省的军队中，控制着全省的军事力量。

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1911**年武昌首先起义，由于力量悬殊，汉阳、汉口在短短时间内得而复失。但革命的风声传遍全国，云南即响应武昌起义，重见光复，继之出兵援川、援黔，促成多数省份相继起义。在推翻千年专制政体、建立民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5年**12**月云南宣告护国讨袁后，即组织编制**3**个军。蔡

锷任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戴戡任黔军司令，归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指挥。三军组成后，即拟订作战方略，第一军向四川进军，第二军向广东进军，黔军向川、黔、湘边境进军为策应，组成的3个军，各级骨干完全是讲武堂的师生。

二 卢汉——云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生

林南园、孙代兴说：

卢汉字永衡（原名卢邦汉），云南昭通县西三区炎山人，彝族。1895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出生在吉迪家族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幼年曾在昭通县立学堂读书。

1911年四川各地反抗清廷，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有云南永善县人魏焕章在家乡召集600余人，前往叙府（宜宾）、嘉定（乐山）一带，参加“同志军”的反清革命行动。卢汉同其表兄龙云及邹若衡等曾参加魏部，继后回师川南宜宾。同年10月，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后，云南军都督府，派滇军“援川”，第一梯团谢汝翼部经昭通入宜宾。魏、邹、龙、卢在宜宾加入援川滇军。1912年，谢梯团回滇，在昆明整编部队，编余的军官佐，送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受训。卢汉以准尉级保送入讲武堂。1914年毕业。

1916年冬，卢汉奉命到四川成都，在驻川滇军成都兵工厂保厂营担任排长，后来升任连长、副营长等职。到1920年四川军人掀起“川人治川”驱逐滇军的运动，滇军被迫退出成都。在泸州战役中，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阵亡。滇军统归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指挥；保厂营撤销，编余的军官全部回滇。卢汉回到昆明，在唐继尧的元帅府当少校副官。1921年顾品珍率领驻川滇

军回滇，驱逐唐继尧。唐继尧被迫逃往香港。临行前，派卢汉拿他亲笔信到个旧找龙云（龙云当时担任第十一团团团长，驻扎个旧），命龙云把队伍带到蒙自芷村车站待命。唐带着“滇飞军”大队到了芷村车站，改编队伍，“滇飞军”编为第十二团，升龙云为第一梯团团长，指挥第十一、十二两团；任命卢汉为第十二团第三营营长，并命龙带领部队到广西柳州。唐继尧去香港后，龙云从蒙自出发前往广西，沿途收编了云南地方部队，扩大队伍。

1922年春，唐继尧由香港返回柳州。率领龙云、胡若愚等部回滇，顾品珍战败阵亡，唐重新统治了云南。唐将第十二团改编为近卫部队，卢汉升任为近卫第三团团长。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民主革命形势发展，引起英、日等帝国主义惊恐。唐继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对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春，派龙云、胡若愚等率军企图配合北洋军阀，南北夹击广东革命军政府。此时，卢汉被唐继尧升为第七旅旅长，归龙云第五军指挥，率军进攻两广。在广西被桂军及驻粤滇军范石生部打败回滇。唐又整编部队，卢汉仍然担任第七旅旅长，属第五军

第二章 六一四政变 危难之中显智勇 善于打硬仗 成为龙云台柱子

1927年，云南爆发“二·六政变”，唐继尧被迫下台。由于倒唐派内部分赃不均，很快又发生火并的“六一·四政变”。这次政变的目的，是倒唐派中的反对龙云派企图将龙云部队一网打尽，置龙云于死地，独霸云南。由于龙云部最亲信的旅长卢汉乘乱化装潜出昆明，收容部队，很快组织反攻，终使龙云转败为胜。

卢汉拥龙有功，又在平定云南、讨伐桂系的战役中，勇猛过人，战绩卓著，遂成龙云在滇的四个台柱子（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之一。其后虽有曲折，但卢汉一直为龙云所倚重。

一 “六一·四政变”中的卢汉旅长

王叔堪*回忆说：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早已成立，而当时云南省省长唐继尧仍然做着闭关自守的迷梦，企图把持该省政权，伺机待发。他

* 王叔堪当时任云南宪兵团团部主任副官。

当时的力量，由于每年的向外扩张，损失太重，已到了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地步，仅只有十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和几连机枪及一个警卫大队。但是因为他已统治了云南 10 年以上，无论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各方面，均为其多年来一手提拔的人，因而他本人的地位，从表面看来是较为巩固的。在军事方面，主要有滇中镇守使龙云，指挥二个步兵旅辖四个团约 5000 人；滇南镇守使胡若愚指挥的兵力同龙云一样；滇东镇守使张汝骥指挥二个步兵旅辖三个团兵力不到 4 000 人；其余约 10 个团的力量，均由唐亲自指挥。他以为云南地处高原，又地瘠民贫，且多年统治排除了异己，不会有内乱，而外敌又不易或不愿入侵，这个土皇帝的江山是稳固的。因而在北伐期间，全国革命空气高涨之际，他既无投降革命表现，也不明确的表示依靠或向北洋军阀决裂，而且对内丝毫无准备，满以为“整军经武”，将来仍可逐鹿中原，他就是这样一个极为糊涂的角色。与此同时，蒋介石则早已对他部下的三个镇守使，进行了分化收买的工作，胡若愚被委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军长，龙云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张汝骥因原有实力较胡若愚、龙云为小，故只得到一个独立师师长的职位，他们三个虽已被收买，但仍慑于唐继尧的威势，还未宣布就职。

“六·一四”政变的前前后后

1927 年 2 月 6 日，即旧历丙寅年的除夕，胡、龙、张三人乘春节欢庆，唐继尧毫无准备的机会，一致举行兵变，胁迫唐继尧交出军政大权，同时命令省城各机关更换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宣称革命已经成功，这即是云南习惯上称呼的“二·六政变”。

唐继尧之死

“二六政变”以后，成立了云南省政府，以胡若愚为主席，

龙云、张汝骥等为委员。此时唐继尧虽被推翻下台，但胡等以多年的部属关系，仍推戴他为云南省政府总裁，名义虽极为崇高，次序亦在主席之前，但纯系一个空头名称，丝毫不起半点作用。唐继尧主宰云南十几年，“靖国”之役，且自称 9 省联军总司令，云南人常称呼他为“联帅”。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时代，被推为政务七总裁之一，而又兼军务院抚军长，并曾委以副元帅等职，平时极为狂妄自大，今被其一手培植起来之部下推翻，屈处于昆明市北门私邸中，其抑忧愤懣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终于以 4 月 25 日病死在家中，时距“二·六政变”不到百日。一代军阀，遂戴其自制的纸糊的假冠，长眠于昆明市区内螺峰山上。

分赃不平，内部火并

胡、龙、张等并不是对革命有所认识而起义的，他们纯粹是一种投机行为，唐死后，主席职位只有一个，一切财政经济职位，均想安插私人，于是分赃不平，矛盾立见而且逐渐深化。他们当中，以龙云军队的作战力较强，而且大部驻扎昆明市区，一部驻滇越铁路中心要镇“阿迷”州，实际上掌握着云南省全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运输的神经中枢。胡、张对于这点是极为不满的，同时更加上民族歧视（龙云为彝族）于是于 6 月 14 日拂晓，联合向龙部驻地北较场营盘包围进攻，同时并派兵包围市区内翠湖边之龙公馆，并施行炮轰，企图将龙部一网打尽，并致龙于死命。但因龙平时治军较为严肃，纪律及战斗力也因之较强，故虽因毫无准备而遭突然袭击，尚能作较有秩序的向滇西退却，并未溃散。同时龙云部最为亲信的旅长卢汉，亦由城内化装潜至祥云附近，收容部队，并在该地经过短期整训，向昆明反攻，由于龙都官兵认为遭到友军如此不义行为，群情极为愤慨，勇于作战，因此在距昆明 200 公里之楚雄县属鹦鹉关，一战即将前来追击之胡部主力击溃，乘胜追击，又在距昆明只 80 公

里之禄丰县，又将应援之张汝骥部击溃，并乘两胜之威而于 7 月 25 日进占昆明，只 40 天功夫，由败转胜，证明了哀兵必胜，而且也证实了龙云平时整练部队，确有他的一套功夫。

龙云成了“独眼龙”，并被用笼囚起

6 月 14 日发生事变时，龙云住在家里，猝不及防，并为炮弹破片伤其左目，乃被生擒。胡、张深知龙云的功夫，因而用一个特别设计制造的铁笼将他囚起，胡、张等以为龙已成瓮中之鳖，毫无作为，只等滇西战事结束，则稳坐主席宝座，谁敢不服从，故一面布告安民，一面将经济、政治之部门，派员逐步接收。殊知好梦不长，霹雳一声，龙部已进逼昆明，只好仓皇退却，并将龙云一起带走，在距昆明南郊 40 华里之板桥镇时，因恐追兵太急，无法抵御，乃将龙云放出，并共同协商对付唐继尧之另一亲信“靖卫队长”王洁修部。因为“六一四”之后，王在其中，离间挑拨，使胡、龙两败俱伤，乘机夺取政权，并有为唐继尧报仇的嫌疑，协商结果，龙云只身潜回昆明，重新指挥其部队。7 月 28 日拂晓，派兵包围王部驻地巫家坝营盘，不到 2 小时，即将王部全部彻底缴械，王洁修本人亦被生擒，并于 8 月初旬，将王枪毙，宣布的罪状是：“煽风点火，阻挠革命，企图复辟”。虽然如此，但云南人都知道，这是唐继尧死后，小军阀的争权夺利，哪里说得上什么革命二字。

胡若愚在板桥将龙云放回昆明后，收拾残部退至四川宜宾附近，依附川军刘文辉，企图待机再起。至此，云南全省军政大权，均落在龙云一人掌握之中，为尔后 17 年的割据统治，奠定了初步基础。

胡若愚反攻，龙云继续得胜

1928 年冬，胡部经过一年的整顿，重新由四川回窜云南。刘文辉等乘机企图扩张其势力，派他的土匪招安部队蒋通海部协

助胡若愚，由川滇边境经盐津、大关、昭通、东川等地，沿途无阻，向昆明挺进。龙云派其勇敢善战之师长张凤春率部迎战，在距昆明 60 公里之杨林羊街地方遭遇，一战先将刘文辉部之蒋通海部全部彻底解决，胡部受此挫折，无力再战，乃向滇黔边境逃窜，并盘据滇东属之曲靖、马龙、沾益、平彝等县。是冬 11 月，龙云集中重兵，由昆明出发，向曲靖地区进击，准备包围该地，彻底歼灭胡部，胡部则据曲靖附廓之廖角山凭险固守，该山地势极为险要，为曲靖之屏障，攻守双方，势在必争。阴历十二月七日大战揭开，胡部全力死守，龙部卢汉、朱旭、张凤春三个主力师均投入战斗，争夺之烈，为滇军内战所少见，而伤亡之重，亦为从来所未有。笔者当时任张凤春师之下级军官，所属之一连伤亡即达 50 余人之多。大战第二天，龙部即将该山全部占领，胡部退据城中，因廖角山失守，县城全部暴露，士气低沉，因此在龙军乘胜攻城之际，不到 3 小时，即全城失陷，狼狈向贵州方向逃窜。

胡、张最后挣扎，终于或死或逃，龙云取得彻底胜利，统一了云南

1929 年 10 月，胡若愚、张汝骥联合原唐继尧直接指挥之第一旅旅长孟友闻所部，共同进兵昆明。是时龙云以累胜之师，且又经将近一年时间之休整，说得上是兵精粮足，而又以逸待劳，且后防亦极为巩固，毫无内顾之忧。而胡、张、孟等则转战二年，兵力极为疲惫，兵源补充无来源，粮饷亦专靠临时筹集，而最感困难的则是屡战屡败，士气不振，以此作战，胜负固早未卜先知矣。龙云处此绝对有利形势之境，仍作了万一的打算，并认为胡、张等这次来犯，系孤注一掷，乃作彻底消灭以绝后患的打算，亲自率领所部迎战，先后于昆明近郊和富民等地，将胡、张残余主力击溃，并乘胜穷追至四川西昌专区所属之会理、盐源、

盐边一带，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不顾严寒，跟踪追击，结果在盐边属之红卡黄草坝等地，乘张、孟退渡金沙江时，半渡而腰截之，将孟友闻击毙于江中，并将张汝骥生擒，胡若愚则只身脱逃，幸免于死，然而全军覆没了。龙云在回师昆明路过大理属之下关时，将张汝骥枪毙，以为异己者戒。从“六·一四政变”至此时为时不过二年余，所有反对龙云的各军，均已完全彻底消灭，云南全省又成了“真正的统一”。龙云亦从此统治了云南，而成为蒋家王朝时代的独树一帜的统治，并达 18 年之久。

以上这段时间，龙云因忙于内战，无力外顾，从他的力量来说，对于蒋介石亦是不足轻重的，也由于他自身力量有限，因而虽然有野心，尚不敢公然暴露，同时内战三年，人力物力财力，均有很大的消耗，而外援又无希望，势必只有从内部整理人手，但这些也必须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才可以得心应手，顺利进行。其中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刘文辉曾派兵支持过胡若愚回滇，现在胡虽只剩一个光棍了，但也不能不使他特别戒备。因而这段时间，他特别佯装服从，事事请命“中央”，实则他早已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割地称雄的目的，因此这段时间蒋介石和龙云的关系表面是很融洽和谐的。

二 帮助龙云打硬仗的卢汉师长

王叔堪说：

自从龙云把云南全省统一以后，即着手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整理工作，同时国内形势亦出现了对于蒋介石极为有利的局面，阎锡山、冯玉祥已先后失败，东北的张学良也表示服从“中央”，眼看四分五裂的现象，有可能统一起来，因而龙云对于蒋介石的拥护也逐渐由模糊转为明朗，其具体的表现，最大者有三件事：